

書叢學文學大央中

史評批學文朝六晉魏

著編澤根羅

行印館書印務商

書叢學文學大央中

史評批學文朝六晉魏

著編澤根羅

行印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上海初版

(82103 滬報紙)

大學叢書 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一冊

定價 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著者 羅根澤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目錄

第一章 文學概念

- 一、文學含義的淨化……………一
- 二、文學概念的轉變……………三
- 三、文學價值的提舉……………四
- 四、社會學術的因素……………六
- 五、葛洪的反古與提倡博富艱深的文學……………九
- 六、蕭統的檳除子史與提倡翰藻的文學……………一
- 七、裴子野雕蟲論……………三
- 八、蕭綱的鼓吹「鄭邦」文學……………四
- 九、徐陵的編輯「麗人」豔歌……………五
- 十、蕭繹的兼重華實……………六

第二章 文筆之辨

- 一、文筆分別歷史……………一八
- 二、文筆分別三說……………一九

三、辭筆之分·····	二二
四、詩筆之分·····	二二

第三章 文體類·····	二四
--------------	----

一、文體二義·····	二四
二、魏晉以前的文體論·····	二六
三、桓範的各體文學方法論·····	二八
四、傅玄的「七」論及連珠論·····	三〇
五、陸機的十分法·····	三一
六、摯虞文章流別志論·····	三二
七、李充翰林論·····	三四
八、左思及皇甫謐的賦論·····	三五
九、顏延之所謂「詠歌之書」與「褒貶之書」·····	三七
十、蕭統文選的分類·····	三八
十一、舊題任昉文章緣起·····	三九

第四章 音律說上·····	四二
---------------	----

一、音律說的前驅——文氣說·····	四二
二、文氣與音律的關係·····	四三

三、范曄的自然音律說·····	四四
四、四聲的發明·····	四五
五、音律在文學上的功用·····	四六
六、甄琛沈約的討論四聲·····	四八
七、陸厥沈約的討論音律·····	四九
八、一班的音律研究·····	五一
九、劉善經四聲指歸·····	五三
第五章 音律說下·····	五六

一、沈約八病說蠡測·····	五六
二、文鏡祕府論所列文二十八病·····	五八
三、王斌的病犯說·····	六一
四、劉滔的病犯說·····	六一
五、沈氏的病犯說·····	六三
六、劉善經的病犯說·····	六四
七、元兢的病犯說·····	六五
八、崔融的病犯說·····	六七
九、佚名的文筆式——文筆十病得失·····	六八
第六章 創作論·····	七〇

一、自莊子至曹丕的天才說	七〇
二、陸機的文學方法論與文學應感說	七一
三、葛洪的天才與方法並重說	七三
四、顏延年及其他雕章琢句的學說	七四
五、蕭子顯的變化說	七五

第七章 鑒賞論

一、魏晉以前的鑒賞論	七七
二、曹丕所言鑒賞之蔽與曹植所言鑒賞之難	七八
三、葛洪的鑒賞論	七九

第八章 論文專家之劉勰

一、劉勰以前的文學批評家	八二
二、作文心雕龍的動機	八五
三、幾個主要的文學觀	八六
四、文體論	九一
五、創作論	九七
六、文學與時代	一〇六
七、批評及其原理	一〇七

第九章 論詩專家之鍾嶸

一一一

一、作詩品的時代及動機

一一一

二、文學上的自然主義

一一二

三、詩之理論的起源與歷史的起源

一一四

四、詩的滋味

一一五

五、詩人的品第及流派

一一六

第十章 北朝的文學論

一二〇

一、北朝的風土習性

一二〇

二、蘇綽及魏收邢劭的尊古崇理文學觀

一二一

三、顏之推的地位及其兼採古今的文學論

一二二

四、文人輕薄的指摘

一二三

五、各體文學的緩急

一二五

六、創作與評論

一二六

第十一章 佛經翻譯論

一二七

一、翻譯之難

一二七

二、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說

一二八

三、鳩摩羅什的「嚼飯」妙喻·····	一二九
四、慧遠的折中說·····	一三一
五、僧叡的研究譯字·····	一三二
六、僧祐的討論漢梵異同·····	一三三
七、彥琮的八備說·····	一三四
八、玄奘的五種不翻說·····	一三六
九、道宣的批評歷代譯經·····	一三七
十、贊寧的六例說·····	一三九

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 (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篇)

第一章 文學概念

一、文學含義的淨化

周秦所謂「文學」，指學術而言，但現在所謂「文學」，也包括在內。兩漢繼周秦之後，仍以「文學」括示學術，而另以「文章」括示現在所謂「文學」。這種分別，直至曹魏猶然。如夏侯惠云：「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一劉劭傳）但也有覺得不當以「文學」括示學術的，由是易以「儒學」。如劉劭人物志流業篇云：「人之流業，有十二焉。」「有文章，有儒學。」「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賁公是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其所謂「儒學」雖不能說是全同於兩漢所謂「文學」，但兩漢所謂「文學」確大半是「儒學」。劉劭不名為「文學」而名為「儒學」，大概因為那時的「文學」二字，已逐漸不是指學術而言了。

「文學」之不用指學術而言，在東漢已開其端緒。張衡南陽文學儒林書贊云：「南陽太守上黨魏君，愍文學之弛廢，懷儒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文學」與「儒林」連舉，「見「文學」不卽是儒林之學。不過止是連舉，而不是對舉，所以不能說其所謂「文學」，即同於劉劭的與「儒學」對舉的「文章」；更不能說即同於現在所謂「文學」。魏邯鄲淳作漢鴻臚陳紀碑云：「研幾道藝，涉覽文字。」其所謂「文學」也大

概略同於張衡所謂「文學」；既非指學術而言，亦非指「文章」而言，實介於學術與文章之間，純是一種過渡的用法。

曹丕（一八六——二二六）作典論論文，稱「文章經國之大業」，還沒有言及「文學」二字。至宋范曄（三九六——四五五）作後漢書文苑傳，始時稱「文章」，時稱「文學」。稱「文章」者，如王隆傳、黃香傳、皆云：「能文章」。傅毅傳云：「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李尤傳云：「少以文章顯」。崔琦傳云：「以文章博通稱」。禰衡傳云：「文章言議，非衡不定。」又云：「其文章多亡云」。稱「文學」者，如傅毅傳云：「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邊韶傳云：「以文學知名」。玩其意蘊，「文章」，「文學」似沒有多大的區別。至何謂「文章」「文學」？范曄於文苑傳贊云：

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實質緣於「情志既動」，形式則是「篇辭爲貴」，與我們所謂「文學」已無大異，不過未鮮明的謂此爲文學定義而已。

至梁蕭子顯作南齊書，特立文學傳，而篇中則稱爲「文章」，言：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

實質方面是：「情性之風標」，「蘊思含毫，遊心內運」，「稟以生靈，遷乎愛嗜」。「形式方面是：「神明之律呂」，「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與現在所謂「文學」，實在沒有多少區別，與周秦兩漢所謂「文學」，則迥然不同了。

此外若宋文帝立四學，「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對立，其所謂「文學」，不惟不包括「儒學」「玄學」，亦且不包括「史學」。劉義慶世說新語有文學篇，所述亦止限於詩人文士。梁書簡文帝紀稱「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文學傳中的劉苞傳云：「自高祖卽位，引後進文學之

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劉暭，暭弟洽，從弟沅，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譚坐。〔同上〕劉惔傳云：「昭明太子愛文學，深愛接之。」其所謂「文學」，也很顯然的略同於現在所謂「文學」，大異於周秦兩漢所謂「文學」。

二、文學概念的轉變

文學含義的淨化，基於文學概念的轉變。本來宇宙萬象，永遠在變化。但變化的過程，有「漸變」「突變」之別。古代文學概念的突變時期在魏晉。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

至於建安（漢獻帝年號，一九六——二二〇）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畜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又云：

降及元康（晉惠帝年號，二九一——二九九），潘陸特秀，律異班馬，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

以前也不是沒有文，但則比較崇實尚質，二則偏於紀事載言。至建安，「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才造成文學的自覺時代。「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才造成文學的燦爛時代。

這是就創作風氣而言。創作風氣隨文學理論為轉移。東漢末年的王逸作楚辭章句序云：「戰國並爭，道德陵遲……屈原……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引見二篇三章六節）還有載道的觀念。曹丕作典論論文，既求言道，亦未言情。陸機（二六——三〇三）作文賦云：

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文選卷十七）

文賦序又云：

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情形，非情感）。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

「理」已不似「道」的嚴酷，「意」更較「理」爲游移；可以包括嚴酷之「道」，也可以包括微溫之「情」。吳時的陸機還兼取「理」「意」，宋時的范曄則棄「理」取「意」。他的獄中與諸甥姪書云：

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都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

文中雖謂「以意爲主」，但又謂「情志所託」，可見其所謂「意」偏於「情」，與陸機所謂「意」之偏於「理」者不同。總之，「道」是最嚴酷的，「情」是最微溫的，「理」與「意」則是由「道」至「情」的橋梁；兩漢的載道文學觀便藉了這架橋梁，渡到魏晉六朝的緣情文學觀。

三、文學價值的提舉

伴着文學概念轉變而來的問題是文學價值。周秦兩漢的時候，文學的價值不在文學的本身，而在文學的紀事載言。曹丕典論論文云：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審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文選卷五十二）

曹丕是提出文學價值的第一人，稱文章爲「不朽之盛事」當然期助甚高。但一則於「不朽之盛事」以前，先譽爲「經國之大業」，則其價值仍然不全在文學本身，而在文學之有「經國」的功能。二則作者的寄身翰墨，且意篇籍，是爲的「聲名自傳於後」，則其重文是緣於「名」而非緣於「實」。

曹丕譽文章爲「經國之大業」，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則詆評賦爲「小道」。與楊德祖書云：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茲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文選卷四十二）

這在曹植或者是憤激之言。此書又云：「僕少好爲文章（他本作辭賦），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又前錄序亦云：「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但因文受累，所以詆爲小道。且自己「位爲藩侯」，因爲乃兄妬棄，不得「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由是止以辭賦名家，當然由憤懣不平，而妬恨辭賦。楊德祖（一七三——二一七）的復書——答臨淄侯牋，便極力爲辭賦辯護云：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德祖名）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皆爲魯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邵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業，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文選卷四十）觀此，知辭賦文章的價值，已爲時人所公認，所以曹植以藩侯之尊，詆毀辭賦，便招錫脩的公然辯詰。而曹植的詆毀辭賦，是由於不得經國立功的憤激心理，也益可瞭然。

阻止文學獨立，壓抑文學價值的，是道德觀念與事功觀念。曹植的不甘「以翰墨爲勳績」，便是重事功，而輕文學。曹丕的稱文章爲「經國之大業」，則是提拔文學，使與事功抗混。爭道德，就是曹丕也覺得高於文學。與王朗書云：「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直至晉代的葛洪，始使文學駕乎道德之上。他的抱朴子外篇有文行一篇，稱「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他的答辯云：

答可棄而未獲，則不得無答；又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述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不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

毫畫紙，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之八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平津館叢書本卷四十五）

此言不止見於文行篇，亦見於尚博篇，可見是葛洪批評道德文學的重要言論。在尚博篇又假爲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不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行本而學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他的答辯云：

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卷三十二）

前者還等視道德文章，此更謂道德爲粗，文章爲精。

由曹丕的提拔，文章已與事功抗混；由葛洪的評贊，文章又駕道德之上。這樣至於梁朝，遂有簡文帝蕭綱的文學高於一切說，答張贊謝示集書云：

竊常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尙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楊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

假使他是魏文帝，祇「辭賦小道」一語，也可置曹植於死罪」。又作昭明太子集序云：

竊以文之爲義，……哉遠矣。……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衡九光之度，方珠喻龍，南樞北陵之采，此之謂天文。文籍生，書契作，詠歌起，賦頌興，成孝敬於人倫，移風俗於王政，道綿乎八極，理浹乎九垓，贊勵神明，雍熙鍾石，此之謂人文。若夫體天經而總文緯，揭日月而諧律呂者，其在茲乎。

六朝文盛的緣故，這種文學高於一切的觀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四、社會學術的因素

這樣一個鉅烈的轉變，當然有多方面的因素，最要者爲下述四種：

(一)由於社會的轉捩。本來人是有理智同時又有情感的動物，發於理智的文學偏於紀事載言，發於情感的文學偏於吟詠情性。漢魏的社會，一般的說來，是由治而亂。治世有光明的前途，理智得到發展的機會；政教有常軌，情感遭受相當的限制。亂世的前途暗淡，理智的計劃無用；政教無標準，感情可以任意發展。所以自建安的文學，「甫乃以情緯文」。紀事載言的文章宜於質，吟詠情性的作品需要，所以自建安的文學「甫乃以文被質」。

這正是就治亂的分野，探求文學的動態。更具體的分析，漢末魏晉，由混戰及其他原因，促成都市及莊園的發展。也是「遺風餘烈，事極江左。」如北方的許都洛下，南方的金陵會稽，都極繁榮，同時也都是文人薈萃之所。都市的文學當然要綺麗華美。至莊園則以兩種的姿態出現：一爲國家莊園。如鄧艾的以軍屯田於陳蔡（三國志，魏志卷二十八，鄧艾傳），徐邈的以民屯田於涼州（同上卷二十七，徐邈傳）。一爲大族莊園。如三國志魏志倉慈傳云：「舊大族田地有餘，小民無立錫之士。」所謂莊園，有供給經濟的莊田，還有供給遊居的園林。當時的園林很發達，最有名者，北爲石崇的洛陽金谷園，南爲王羲之的會稽蘭亭。一時的文人，不是自有莊園，就是做有莊園者的清客，由是表現爲「憐風月，狎池館」（文心雕龍明詩篇）的文學。園林中的點綴不能止有花草還須有美人。同時小民既無立錫之地，生活困難，也止有將自己的子女，賣給大族爲奴婢。世說新語汰侈篇載「石崇每宴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飲客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可見美人在園林中的地位。而在這裏的文人作品，自然又表現爲「醇酒婦人」。前者是自然文學，後者是浪漫文學，兩者都是「以情緯文」，同時也都需要「以文被質」。

(二)由於政治的變遷。這是劉勰鍾嶸已經說過的。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云：「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鍾嶸詩品序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蔚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可見建安時代的文學

特盛，與曹公父子的政治的力量提倡有關。建安十五年，曹操令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三國志魏志卷一武帝傳）二十二年，又令舉「被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同上）影響於文學的，當然棄道緣情。

（三）由於經學的衰微。經書所載，雖未必都是聖人之道，但後世卻謂聖人之道載之於經，由是經書成了道德之府，而宗經爲文者遂偏於「道」，反經爲文者則偏於「情」。裴子野反對自宋迄梁的的雕蟲之文，謂當時的「閭閻少年，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詳七節）可見「吟詠情性」，使「擯落六藝」，而「擯落六藝」，也使「吟詠情性」。創造宮體詩的蕭綱，反對宗經，與湘東王書云：「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詳八節）更可見「緣情」與「宗經」的勢不兩立。顏氏家訓序致篇云：「雖讀禮傳，微愛屬文，」（卷一）也認屬文與讀禮衝突。兩漢是經術獨尊的時代，所以載道尙用的色彩，特別濃厚，就是唯美的辭賦，也要給予「諷」「諫」的功能。（詳二篇三章五至八節）盛極而敝，至東漢末年的桓靈時代，釀成黨錮之患，有名的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率皆身首異處，親友株連。作史者溯厥原始，推於「自武帝以後，崇尚儒術，懷經協術，所在霧會。」（後漢書黨錮傳）由是士子視經學爲畏途。南史儒林傳稱：「魏正始以後，更尙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學。」顧炎武日知錄云：「東漢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卷十三兩漢風俗）唯其經術節義衰，所以文章才盛；唯其經術節義衰，所以文章才轉於「緣情」。

（四）由於佛經的東漸。佛經的傳譯，確如僧祐所言：「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出三藏記集卷一，名錄序）而文學觀念的轉變，恰在稍後的魏晉，其中機緣，可以推知。鳩摩羅什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詳四篇八章三節）恐怕「失其藻蔚」，正是求傳其藻蔚。是由譯經的求傳藻蔚，使創作的風尚也趨向藻蔚。如再分析證明，則文學的講求音律，由於「轉讀」「梵音」；文學的注重辭藻，由於「唱導」